

协商建立新中国

□ 路运占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有20多批、1000多位党外人士纷纷进入解放区，为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候为何要一心请党外人士来协商建国呢？

全力争取最广大人民的普遍支持

尽管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来之不易，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不是源于武装斗争，而是源于广大人民。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1949年，即将走上执政舞台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得到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党外人士进行协商建国，是取得最广大人民支持的必要途径。

在各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加强与人民的沟通和协商。194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城市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 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来自社会各领域。民主人士费孝通也参加这次会议，他看到“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坐在一个会场，一起讨论问题，不由感叹“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8月13日，毛泽东到会祝贺并提出，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

有效解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权代表性问题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的时候，明确提出成立新中国的两个步骤：一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二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来成立新中国。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许多地方刚刚解放，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不

具备召开条件，所以只能由政治协商会议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人民代表大会由选举产生，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所以解决新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关键问题是增强代表性。

一方面，从人数上增加代表性。在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劳动节口号之后，中共最初准备在哈尔滨召开政治协商会，拟由30个单位、180名代表参加。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1949年6月，以李维汉为组长、章伯钧为副组长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名单及代表人数。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意见，最终确定45个单位及特邀代表662人参加会议，比初定的180人翻了三倍多。从成分来说，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有代表出席；从地区来说，东北到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东南到台湾，各省区都有代表出席，还包括少数民族及国外侨胞。有代表提出，只叫新政协无法与原来的旧政协真正区别开来，周恩来建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加上“中国人民”四字，得到大家的赞同。此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便沿用下来。

另一方面，通过广泛协商增加代表性，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夯实新中国政权的代表性之基。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为例，它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该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周恩来、许德珩担任，组员包括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廖承志、邓颖超等各方面人士23人。《共同纲领》初稿完成以后，反复讨论和修改了7次，包括先后到达北平的各界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了两次，第三小组自身讨论了3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9月22日，《共同纲领》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又经过与会代表的讨论和修改，最终于29日通过。

广泛凝结党内外人才建设新中国的合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香山，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即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历史角色也即将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向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转变。此时，国家建设方面的人才，尤其是城市管理、建设等方面的人才大多在党外。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党员人数为448.8万，从成分上来看，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和军人，占到86.1%，其中农民党员又占大多数。从学历上来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约15万人，只占3.3%。这个时候，仅凭中共一己之力想要把国家建设好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团结党外的人才和力量共同奋斗，协商建国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

在新政协的662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党外代表占了大多数。中央统战部曾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表册，毛泽东看后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协商建国、包罗万象的“天书”。通过协商建国，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加融洽，当时党外人士在各级政权机构中也占了很大比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副总理4人中，党外人士2人，政务院委、部、会、院、署、行等共有34个部门，党外人士担任正职的有15人。这就广泛凝结了党内外各方面人才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协商建国的伟大实践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伟业，搭建了共和国的“四梁八柱”，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民主团结的形象，对我国探索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产生深远影响。

人民炮兵的奠基人

——朱瑞同志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李 波 潘文曼

朱瑞，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奠基人。1948年10月1日，朱瑞在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他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指挥员。为了缅怀朱瑞的丰功伟绩，锦州市义县人民于1987年4月在其牺牲地建成了朱瑞纪念碑。纪念碑为砖石结构，大理石贴面，通高8米，碑基呈正方形，建在边长12米的6阶式平台上，碑身镶嵌有汉白玉，正面刻有杨尚昆题写的“朱瑞同志纪念碑”7个金色大字，背面镌刻着义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题撰的朱瑞生平碑文，寄托了义县人民对朱瑞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无限怀念。碑文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

朱瑞同志一九〇五年生于江苏省宿迁县。早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大学。一九二五年东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二年去江西中央苏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红三军政治委员和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红军长征中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并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列席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的揭露张国焘错误的政治局会议。到达陕北后，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一九四三年秋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五年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率炮校师生到东北建立炮兵部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员、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学校校长。一九四八年秋参加辽沈战役，不幸于十月一日解放义县的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四十三岁。

朱瑞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所建立的卓越功勋，永远为人民所怀念。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他的英名将永垂不朽！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义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立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迁此
蔡玉衡书并勒上石

碑文忠实记述了朱瑞为革命献身的一生，充分展现了他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进程中的历史贡献，特别是为炮兵建设立下不朽功勋。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建立的卓越功勋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崇高革命精神，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并激励后人。

引领炮兵正规化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朱瑞率领军延安炮校到东北筹建炮兵部队。日本侵略者战败后，在中国东北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炮兵建设需要的武器装备。朱瑞认为武器的收集极为有利于发展我军炮兵。从东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炮校党委把朱瑞总结的“分散部队，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作为工作方针落实，深入东北各地广泛收集火炮和相关器材。在东北广袤大地上，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自长春，北到虎林，只要是日本军队活动过的地方，炮校都派人去了解收集。至1946年5月，炮校师生共收集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这些积累对于东北炮兵部队初建至关重要。

在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炮兵的起步阶段非常艰难，编制、装备不统一，力量分散，指挥不便。1946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成立炮校和炮兵调整处，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朱瑞任炮校校长兼炮兵调整处处长，协调总部处理炮兵建设调整事宜。10月，朱瑞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自此以后，东北炮兵由分散发展走向统一领导。随着东北解放战争步伐的加速，炮兵建设需要迅速适应战争的新形势新要求，朱瑞向部队发出了“苦练一个月，准备打胜仗”的号召，制定了“学与用结合”的炮校教学方针和“广泛的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使用”的炮兵建设方针，东北炮兵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1947



年上半年，朱瑞率50多个炮兵连队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相继取得丰硕战果，为扭转东北战局立下了赫赫战功。

“炮兵之父”为革命捐躯

东北解放战争的丰富实践，给炮兵建设以广阔的发展进步空间。在朱瑞的领导下，经过多次实战，东北我军炮兵战技术水平和指挥能力逐步成熟，发展到能支援步兵攻克十几个师、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通过战场的反复实践，朱瑞研究提出一系列炮兵战术原则，主要包括步炮协同、集中使用火力、攻坚作战等。这些战术原则对我军炮兵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推动人民炮兵建设良性发展。至1948年8月，东北部队共建立16个炮兵团，2个高射炮团和若干师属山炮营，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为东北我军开展夏、秋、冬季攻势取得完全胜利，特别是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武装力量基础。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向北宁线奔袭，朱瑞指挥炮兵纵队参加攻克锦州以北国民

军军坚固据点义县县城的战斗。炮兵进入阵地之前，朱瑞亲自到前沿阵地，一边查看，一边指挥部署。10月1日9时30分，炮兵开始实施火力准备。经过一个小时的炮火袭击，将南面和东面城墙炸开了3个三四十米宽的大口子，掩护步兵迅速突入城内。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为了观察实况、总结经验，朱瑞不顾同志们的反复劝阻，亲自前往城南突破口实地查看城墙被炮火破坏的情况，途中不幸触雷牺牲。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巨大损失。”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194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讣告，高度评价朱瑞对东北解放的贡献：“朱瑞同志以他科学的头脑，发扬‘炮兵是战争之神’的思想，已在两年来东北解放战争中，特别是攻坚战中收到显著效果，把人民解放军的兵种，提高一步。这是朱瑞同志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贡献，对人民不可磨灭的功绩”。为纪念和褒扬朱瑞为人民炮兵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央军委同意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陕西党团组织的创建人雷晋笙

□ 陈安杰

雷晋笙1898年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一个贫苦家庭。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社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团，192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陕西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曾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等职，两次被捕入狱，视死如归，牺牲时年仅33岁。

“晋笙是个有为青年，给党做了不少工作”。1920年秋，雷晋笙在湖南旅沪青年李启汉的介绍下，进入上海外国语社学习，在此结识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从而了解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和斗争经验。他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经典书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提高阶级觉悟，早期党组织在沪西小沙渡纱厂创办了工人半日学校，雷晋笙等外国语社学员承担了定期为工人授课的任务。在李启汉的带领下，他们还去附近纱厂组织工会，创办劳工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俄国革命和工人斗争情况。

在外国语社学习期间，经李启汉等人介绍，雷晋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建团时期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为了帮助团员提高政治觉悟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内每周有一次政治报告会，经常邀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李达等作报告。这一时期，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雷晋笙和严信民创办了《新时代》旬刊，主张用劳工革命的方法改造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雷晋笙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此，雷晋笙更加积极地为党工作。当回忆起外国语学社的往事时，沈雁冰对雷晋笙的印象特别深刻，称赞“晋笙是个有为青年，给党做了不少工作”。

共产党人“要向群众讲真理”。1924年春，雷晋笙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西安，对群众开展宣传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着手在陕西筹建党团组织。他组织学生读书会，介绍《新青年》《向导》等党的报刊，鼓舞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他还利用假期，举办讲习所，主讲《共产主义ABC》，吸收进步青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参与建立团西安第一支部的工作。是年秋，雷晋笙联络吕佑乾等人成立团的外围组织西北青年社。同年12月，组织成立西北晨钟社，出版《西北晨钟》旬刊，宣传革命理论。

1925年10月，雷晋笙参与整顿和建立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的工作。在整顿团组织的同时，他与魏野畴、刘含初等党员骨干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任支部委员，这是豫陕区委领导下西安地区成立较早的党组织。在西安特别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中共西安地委，雷晋笙被选为领导成员，成为陕西地区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1926年4月，雷晋笙遵照党的安排，把共青团、工会筹委会等组织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守卫西安城的宣传斗争，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次斗争，有力打击了直系军

阀，策应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是陕西党组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大胜利，雷晋笙发挥了共产党员的中坚作用。次年2月，陕西国民日报社改组，雷晋笙调任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他在学校建立秘密党、团支部，成立学生会，使第一中学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学府，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响应党的号召、开展革命斗争的红色阵地。其间，雷晋笙参与编写《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进化史》以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等10余种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陕西各界于5月5日召开各阶层民众参加的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马克思诞辰，雷晋笙作即席演讲，声讨反动派的罪行。5月16日，雷晋笙在主持李大钊追悼大会上慷慨陈词，号召继承烈士遗志，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当敌人发出恐吓，让他保持缄默时，他愤然对敌人说：“共产党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向群众讲真理！”7月中下旬，国民党开始在陕西“清党”，中共陕西省委采取应变措施，党组织转入地下工作。雷晋笙被迫前往武汉。10月，他被中央派往开封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在白色恐怖下，雷晋笙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要杀快杀，无话可讲！”1928年2月，河南省委在领导了确山暴动之后，正研究制定其他地方的暴动工作时，雷晋笙在开封不幸被捕，先后被捕的还有省委书记岳易云、组织部部长任作民等，被关押在开封第一监狱。雷晋笙在

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守党的机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对敌人的斗争，建立狱中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创造“乐谱”为狱中秘密通讯方式，发动绝食斗争，同狱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工作。年底，在地下党员南汉宸的营救下获释。

1929年11月，雷晋笙被中央调往山东任省委秘书长，化名李克平，重建连遭敌人破坏的山东省委。当中央负责同志跟雷晋笙谈到重建省委机关是一项艰巨任务时，雷晋笙信心满满地说：“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1930年1月，雷晋笙正在为建立新的山东省委机关日夜奔波时，因交通员叛变在济南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轻蔑地说：“别来这一套，要杀快杀，无话可讲！”他在给同为共产党员的妻子李淑清的信中，叮嘱她要努力为党工作，迎接革命的胜利。

1931年4月5日凌晨，雷晋笙与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共产党员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慷慨激昂地走向刑场，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

